

腐败的测量方式与影响因素：一个文献综述

徐国冲 朱江华峰*

【摘要】 学界关于腐败的研究甚多，集中在腐败产生的根源和影响的探讨上。基于此，本文从腐败的测量方式和影响因素着手梳理国内外的经典文献，以呈现腐败研究的动态进展。研究发现，腐败方式测量与影响因素的探究均进入了较为成熟、规范的阶段，除了经典性理论探讨外，更多以定量分析展开，且在变量操作化、模型构建以及分析层面频繁地使用多学科技术手段；而国内研究无论是研究问题还是研究方法均趋向与国际接轨。本文重点探讨了腐败的影响因素模型，将其划分为经济、政治、社会和媒体四个维度。在未来研究中，可从腐败测量方式的多元化、腐败研究的理论整合、关注腐败的微观影响因素、腐败的实证操作化等层面深入探究。

【关键词】 腐败；腐败测量；影响因素；文献综述

一、问题的提出

腐败的危害不言而喻，尤其是在那些腐败高发的国家。高水平的腐败与经济增长率下降、公共基础设施不足、公共开支增加、收入不平等及国家安全风险密切相关。腐败也往往会扭曲决策者、服务提供者和受益者的动机和激励^[1]。腐败已成为全球治理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据估计，除了贪污公款和盗窃公共资产外，贿赂在全球每年总共至少有 1 万亿美元，其中发展中国家公职人员收受的贿赂约为每年 200 亿美元。在中国，腐败问题亦是不容小觑。虽然腐败的危害显而易见，但学界对于什么是腐败、如何度量腐败却是仁者见仁，哪些因素会诱发腐败也是智者见智，仍未取得共识。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国内外腐败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归纳，以探讨现有研究是如何度量腐败及

腐败的诱因。囿于腐败研究的文章较为繁杂，故仅筛选具有较高质量且不重复的研究论文。筛选条件如下：国内文献来源于 2000 年以后的核心期刊，且以实证研究为主；国外文献来源于 SS-CI，既包括研究腐败的经典理论文献，也涵盖研究腐败的前沿实证论文。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对腐败的测量方式作简要的梳理与评价；其次归纳提炼腐败的影响因素，继而构建出腐败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最后讨论本研究对于中国反腐败的意义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以供进一步探索。

二、腐败测量方式：主观与客观

虽然测量腐败的方式众多，但鉴于腐败交易具有模糊性和隐秘性，因而真正量化腐败并非易事。较为知名的测量方法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公布的总体感知指数，如透明国际的腐败感知

* 徐国冲：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xuguochong@xmu.edu.cn；朱江华峰：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615838014@qq.com。基金项目：本文受厦门大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720181099）资助，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效度和实现程度研究”（编号：18JZD047）的阶段性成果。

指数 (CPI) 和世界银行的腐败控制指数 (CCI)。然而, 这些测量方式因数据来源的问题受到了学者和从业者的批评。因为不同来源的数据聚集会导致概念上的不精确性, 并且测量指标本身的主观性使得它们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导致人们产生偏见从而无法准确测量腐败^[2]。由此, 腐败测量方式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 多样化的测量方法开拓了腐败研究的新领域。从既有研究看, 腐败测量方式主要分为如下两种:

(一) 基于主观感知的腐败测量

较为常见的腐败主观感知测量方式有如下四类: 一是 CPI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即透明国际的腐败感知指数。该指数通过合并多个调查机构的数据而成, 被广泛地应用于跨国比较的实证研究中^[3-4]。CPI 首次提供了一个可用于逐年比较不同国家腐败看法的数据库。许多研究试图通过 CPI 找寻腐败的根源, 故该指数的重大贡献是为定量分析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大样本面板数据^[5]。二是 CCI (control of corruption index), 即腐败控制指数。该指数的数据来自全球 20 个分散的机构, 同时也是世界治理指数的测量指标之一。它具体通过 “transparency” “public perceptions of corruption” “nepotism or cronyism” 三个指标进行测量, 应用范围广泛, 至今已覆盖全球 212 个国家和地区。三是行贿指数 (corruption index), 用于测量公司行贿意愿的程度。它由商业高管进行评估, 不定期发布。曾于 1999、2002、2006、2008、2011 年发布。截至 2011 年, 该指数已覆盖了经济规模最大的 28 个国家, 影响也较为显著。四是商业环境和企业绩效调查 (BEEPS), 是最大和最详细的跨国调查, 涉及的腐败问题较为广泛。它涵盖了 22 个转型国家的 4000 多家企业, 于 1999—2000 年首次进行调查。需要说明的是, 该调查形式较为特殊, 主要围绕腐败活动询问 “您行业中典型的公司”, 而非直接询问被访公司的腐败行为^[6]。通过该调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考察企业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 以更好地理解腐败问题。

然而, 这种基于主观感知的腐败测量方式被许多学者所诟病, 认为它与真实腐败情况联系微

弱, 无法真实测量客观的腐败情况^[7-8]。具体原因归纳如下: 一是腐败测量与其他测量关联度高, 并不能有效测量腐败。二是腐败指数测量具有 “滞后性”, 即腐败指标仅是对已经发生的腐败进行测量, 却无法成为腐败的预测指标。因此, 若将腐败指数用于指导政策或投资决策应慎重。三是这些指标衡量的是人们对腐败的看法, 而不是腐败本身, 因此使用认知指数进行测量可能难以触及腐败的本质问题。原因在于当受访者被要求考虑腐败情况时, 他们实际上只是在思考总体危机水平或治理不力的情况。同时, 个体特征也使得对腐败的认知与客观估计的腐败程度存在偏差。四是腐败测量的很多指标未被精确定义, 指标的模糊化导致无法对腐败进行精确测量^[9]。

因而对于考量我国的腐败而言, 主观感知指数仅能作为部分的参考依据, 不能照搬照信。指数本身即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 且我国的腐败情况更为复杂多样, 所以需要结合多种测量方式全面、客观地把握真实的腐败程度。

(二) 腐败的客观测量

有学者将客观测量的方式概括归纳为四种类型, 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洞见: 第一种是官方数据, 主要为司法部门发布的腐败案件数据, 操作化方案包括 “职务犯罪的立案数或者查处数” “每万名公务员中的腐败案件数” “每万名居民中的公务员腐败案件数” 等; 第二种是研究者自建的各种案例库和样本库, 涵盖腐败案件、腐败官员等; 第三种有效方法是通过价格或总额比较; 第四种是个案追踪调查数据^[10]。

因循这些分类, 可以发现已有研究利用了多样式的客观数据对腐败测量作出了有益探索。较多使用的是官方调查数据, 例如 Seligson^{[7]381-404} 使用受害者调查数据来进行贿赂的定量研究; Olken^{[8]950-964} 和 Ferraz 等^[11] 依靠审计调查数据来衡量地方政府的欺诈行为; Gorodnichenko 等^[12] 为了研究公职人员的腐败情况而使用公务员收入和消费之间差距的调查数据。另外, 学者也通过自建样本库尝试新型的腐败测量。其中较为经典的研究是根据跨境腐败案件涉及的公职人员的地理分布情况, 创建一种新的跨国腐败测量

方式，即公共行政腐败指数（PACI）。该指数的优势在于可以与认知指数之间进行比较，并能考量它们之间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系统性因素造成的。如今，随着更多跨境贿赂事件数据的提供，PACI将成为越来越有效的跨国腐败测量方式^{[9]196-219}。通过这些客观数据进行腐败的测量，为研究人员与决策者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有助于提出有关腐败的新问题并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来消解腐败问题。

综上所述，测量腐败的方式大致可分为主观测量与客观测量两种。每种方式有其自身的价值、适用范围与局限性，不可一概而论。值得指出的是，最新的研究已经在逐步探索新型的测量腐败方式并验证其科学性与稳健性。随着科学测量方法的推陈出新，我们不应该囿于传统的测量方式，更不应该完全拘泥于CPI、CCI等传统的腐败测量指数，应以批判性的眼光去尝试构建适合自身研究的腐败测量方式。尤其当这些测量方式运用到探究我国的腐败问题时，应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深入考察诱发腐败的相关因素，如制度背景、文化传统等，从而才可选择最恰当的腐败测量方式。正确测量方式的运用也可以提高研究发现的精确性，因为腐败研究的显著性与腐败指数的选择有很大关联^[13]。诚然，无论是主观测量还是客观测量，都应基于现实要素全面思索，不能一味沿用，应将其中的精髓巧妙融合并批判性地去透析我国的腐败问题。

三、腐败影响因素：四因素模型

腐败的影响因素历来都是腐败研究的重点话题，相关的文献也是层出不穷，源于诸多因素似乎都与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科利尔^[14]曾将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进行统合建立影响腐败的研究框架；他的跨学科腐败模型将博弈论与制度选择分析框架相结合，试图通过代理人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动力来理解腐败。这意味着腐败的发生应该在经济、政治、社会这三个领域寻找原因：大致的推理是经济机构为腐败提供金钱诱因，而政府监管机制的缺失以及社会文化层面的非正式社会规范使得腐败在政治和法律层面

也得以滋生^[15-16]。科利尔的模型后续得到了诸多的应用，成为探究腐败诱因的经典框架。基于科利尔的模型，Judge等^{[15]93-103}对42项实证研究进行了多元分析，研究验证了科利尔模型所预测的结果，即国家腐败程度与三组宏观环境因素密切相关。更具体地说，低水平的腐败应伴随着政治开放（自由民主、选举规则、公民表达、政治自由和权利、新闻自由）、经济财富（相对高的国内生产总值、净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以及相对较低的失业率和相对较高的教育水平。本文借鉴该基础理论模型，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增加“媒体”这一要素，从而构成本文探讨影响腐败的四种因素，即从经济、政治、社会、媒体四个维度依次展开对现有文献的述评，并作进一步思考。

（一）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往往被认为是腐败的主要动因。诸多研究认为经济发展（人均收入增多）是减少腐败的最强决定因素^[17]。也有研究发现自然资源禀赋影响腐败，即资源较多的国家显然更为腐败，可能原因是资源充沛带来的意外收益为腐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18-19]。尽管相关探索均有一定参考价值，但需要细分经济因素中的不同维度，从而获悉影响腐败的具体经济要素。本文选取影响腐败的经济要素中较为重要的三个维度进行梳理：公共财政、政府审计和个体收入，并作相关评述。

1. 公共财政

公共财政因素是影响腐败的重要变量，一般包括财政透明度、财政分权和税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财政透明度是保证清廉的重要前提，然而利用中国的数据分析发现财政透明度的提高虽能够抑制腐败但作用相对有限^[20]。至于财政分权，它被认为是中国式官僚腐败频发的制度性原因。通常认为财政分权与地区腐败水平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即财政分权可能对地区腐败具有抑制作用^[21]。但是，随着地方政府收入型分权与自主型分权的渐进式增长，分权引发的晋升锦标赛通过强化财政竞争行为也会助长地方官员腐败^[22]。因而对于财政分权如何影响腐败仍需进一步探索。从税收角度来看，其与腐败之间又有

何种联系?研究发现腐败与非官方活动的增加有关,反过来会导致税收收入的下降^[23]。Johnson等人^[24]认为非官方行业的逃税会削弱政府向公共部门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当税收收入下降时,政府不得不借助贷款来资助项目,因而政府可能愈加腐败,使其陷入腐败和借款的恶性循环。另外,腐败也充当着影响税收与其他要素的中介变量,例如税负可通过公共教育支出、腐败、政府效能及贸易规模的传导作用影响创新及创业水平^[25]。通过探讨公共财政因素对腐败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公共财政如何作用于腐败。尤其对我国的腐败而言,公共财政是一大关键焦点,必须着力探讨财政要素与腐败的关联,为减少腐败提供有效的切入口。

2. 政府审计

与公共财政的监督紧密相连的是政府审计,因而这一维度也对腐败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在政府官员腐败治理中,政府审计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的优势,其实质是依法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的行为^[26]。有研究通过利用1999—2012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发现审计揭发问题绩效与地区腐败水平具有交互的正向影响,随着审计发现违规金额的扩大,腐败水平也相应提高,但审计揭发问题并不会必然降低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同时,审计整改绩效与地区腐败水平负相关,验证了审计整改在抑制地区腐败发生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现实反腐的有效性^[27]。另外,审计投入越大,则表明国家审计的问责力度越强,腐败治理也就越有效果^[28]。故而,“政府审计”成为理解腐败增加或减少的又一动因。政府审计的落实与否与腐败程度有着直接的联系,虽然政府审计的落实并不能带来一蹴而就的腐败治理效果,但是从长远来看,该手段是有效抑制腐败的重要途径。这也是近年来我国几度刮起“审计风暴”的原因所在。

3. 个体收入

公民的个体收入状况在一些学者看来也是影响腐败的重要因素,因而必须纳入影响腐败因素的考量范围。随着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增加,富人拥有更多可支配的资源以用于合法地购买非法物

品,比如使用贿赂或关系来影响执法过程(官僚腐败)和购买有利的法律解释(司法腐败)^[29],即产生了腐败行为。而且,个体收入与腐败也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有研究对129个国家进行比较分析,支持了使用不同腐败指标(世界银行控制腐败指数和透明国际腐败指数)作出的假设,并发现由于腐败反过来导致收入不平等,结果是社会往往陷入不平等和腐败的恶性循环之中^[30]。由此看来,个体收入与腐败似乎是相辅相成的。

在公民的个体收入对腐败影响的研究中,其中关于公务员报酬如何影响腐败是学界探讨的热点话题之一,现有研究得出三种不同结论:其一是公务员薪酬和腐败有正相关关系。相关研究基于G省21个地级市2006—2010年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最终指出公务员相对工资与腐败程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工资水平并未起到遏制腐败蔓延的作用^[31]。其二,有研究指出公务员薪酬始终与腐败程度保持显著负相关关系^[32],增加公务员工资对反腐败发挥了积极作用^[33]。其三,研究发现公务员相对工资对腐败的程度高低没有解释作用^[34]。由此可以看出公务员薪资对腐败的影响学界并未达成一致的结论,研究中选取的变量、数据来源均会对结论造成一定影响。

4. 小结

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中各类经济因素对腐败产生影响的研究,可以发现:影响腐败的经济因素主要集中在公共财政、政府审计与个体收入等方面。当然除了上述要素,很多文章关于经济因素如何影响腐败也做了宏观叙述,例如针对我国经济发展对腐败有何影响,有学者指出:“经济增长很可能以腐败增加为代价。改革时期中国腐败的增加是经济改革的直接后果,虽然在1992年取消双重价格体系之前,腐败可能对发展产生有利影响,但在1992年以后的腐败一直是造成贿赂者低效率和受贿者更加富有的根源。”这说明中国腐败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双重悖论,Andrew Wedeman^[35]提供系统性的论证来展示经济改革与腐败如何共同发生,指出了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腐败模式的转变,声称中国

的腐败已经达到了一个稳定的状态，官员从经济增长的交易中获利。这个双重悖论对理解中国腐败的来源和形式及其如何嵌入经济改革作出重要贡献，也为中国及其他国家关于腐败与经济增长和国家能力的探究作出贡献^[36]。故针对我国的现实情况，应当深入考量经济要素如何逐步嵌入腐败之中，并如何作用于腐败。公共财政、政府审计、个体收入对于研究我国腐败的产生都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但也需要辩证地看待这些经济因素对腐败的影响，不能盲目定论。

总体来看，经济因素对腐败影响的研究呈现如下特点：（1）实证研究占据主导性的地位，多通过面板数据并利用计量模型分析经济因素对腐败产生的影响；（2）归总诸多研究发现，关于经济因素对腐败造成的影响学者们并无一致结论，这主要源于测量的国家与地区、时间、测量方式、使用模型的不一致而造成，故关于此方面的探讨仍有待深入挖掘与相互验证；（3）国内外的研究开始在方法上趋于一致，但在研究视角上多有所不同：我国较为偏向具有我国特色的经济行为的研究，而国外的研究范围则更加宽阔；（4）既有研究仍是偏重宏观经济要素的探究，对于微观经济要素的研究较少，诸如从家庭、个人资产层面去探究如何影响腐败，需要学界再做探索性的尝试。

（二）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与腐败的联系也颇为密切，腐败产生的政治动因也较为多样化。学界对于政治因素如何影响腐败作了详细探讨，解释变量包括诸如民主、政府规模和权力下放等。基于相关的研究，本文从影响腐败的政治因素的三个维度进行具体梳理：政治制度、政府规模与权力、政府官员的政治晋升。

1. 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对腐败的影响“似乎”较为直接，大量的研究对此作出说明。一般经验证据表明，拥有多数民主选举制度和长期接触民主的国家存在较少腐败^[37]。然而，也有研究表明虽然民主（例如选举竞争、政治权利）理论上应该能够反腐败，但实证研究发现了不同的结果：Treisman^{[37]399-457}的结论是民主国家在建立40年之后

才显著减少腐败；Montinola和Jackman^[38]的研究表明，民主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部分民主化可能会增加腐败，但一旦超过一个阈值，民主就会抑制腐败。同样的，对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民主对于腐败感知的影响具有双重作用：在直接效应上，民主程度越高的国家，民众腐败感知的平均水平越高；但在调节效应上，民主作为一种宏观制度环境，会增强自我经济评价对腐败感知的负向影响^[39]。因此，关于民主制度是否可以真正反腐仍有待商榷，其反腐功效必须限定在一定的时间、地域框架内。我们在进行腐败测量时必须考虑整个大的政治制度环境，腐败会弥散在整个政治环境中^[40]。因而需要以宏观的视角、结构的眼光去看待政治制度问题。民主并非一定可以减少腐败，腐败的产生与政治制度有多大的关联以及如何作用需要更进一步的探索。

2. 政府规模与权力

政府规模的大小与腐败的程度也有联系。一般认为政府规模较大或政府干预的程度较大会增加腐败^[41]，但也有经验证据表明政府规模越大而腐败程度较低^[42]。因此不可一概而论，需要针对特定的研究地域来考量政府规模与腐败程度的正负联系。

相比于政府规模，政府权力对腐败的影响更令学者关心。其中，对于权力下放有过诸多的探讨。但是，研究者关于权力下放对腐败的影响并未达成一致观点，甚至出现矛盾的结果^[43]。正如区域间竞争模型指出了分权与腐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这是因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为了竞争物品，限制了官僚从服务提供中获取收入的权力^[44]。同样的，Persson等^{[37]958-989}持类似观点，认为在一个分散的官僚机构中，代理人直接对他/她的行为负责，导致更直接的问责制和更好的绩效，最终导致权力下放与腐败之间负向的关联。然而，利用巴西地方政府审计报告中提供的信息进行验证，结果却表明无论采用何种分权措施，权力下放与腐败之间都没有关系^[45]。在我国，权力下放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之一，近些年相关的改革也在逐步尝试。因此，关于权力下放如何影响我国的腐败有较大的研究拓展空

间,可利用相关的数据进行有益的探索尝试,为腐败的国际研究增添中国样本。

3. 政府官员的政治晋升

政府官员的政治晋升同腐败的联系是学界研究的焦点。此类研究繁多,其中“晋升锦标赛”便是一大典型。学者们易于将官员晋升激励与腐败联结,同时更多数据的开放增加了研究的便利程度,因此相关成果层出不穷。无疑地,政治晋升是重要的研究增长点,而任期就成为研究腐败的关键变量。相关研究发现官员任期与腐败程度之间存在 U 型的曲线关系^[46];并且在企业中政治晋升与腐败之间也呈现密切关联,高层的政治晋升预期越高,发生违规腐败的可能性越小;但却更容易发生公款消费、寻租等隐性腐败^[47]。也有探究地方官员任期和腐败与企业研发投入三者的联系,发现呈显著的倒 U 型曲线关系,即适当延长官员任期和适度的腐败水平皆有利于促进辖区内的企业研发^[48]。另外,政治周期与反腐之间也存在关联:有研究通过构建一个最优反腐败力度的理论模型而分析了政治周期与反腐败之间的关系,推测从中央直接调任纪委书记的省份,或者媒体曝光度越高的省份,政治周期对反腐败力度的影响越是显著^[49]。以上的研究结论基本呈现了当下官员政治晋升与腐败研究的初步成果,这类研究在我国历来都是热点话题,因而更需要有新的探索思路,不应拘泥于在传统理论模型下利用已有数据库进行研究,而是创新研究方式或研究视角以作探索。

4. 小结

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发现,关于影响腐败的政治因素主要集中在政治制度、政府规模与权力、政府官员的政治晋升等方面。总体来看,呈现如下特点:一是总体而言,实证研究仍然占据主导性的地位,且在数据收集方式上多为自主采集,而在变量的选择上并无过多一致,主要依据研究者的个人选择而设置;二是研究结果呈现较多的分歧之处,这种分歧主要源于数据搜集上的自主性、不同的国情,虽无法判断孰优孰劣,但是给后续研究者留下思考与比较的空间;三是研究多从宏观政治因素出发考量其对腐败产生的影响,微观政治因素如政治心理等相关探索阙如,

而在国内因数据采集困难等因素使得相关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多为理论性的探讨,在国际上多为跨国跨年份的实证比较,研究更为成熟、系统;四是在具体针对政治因素对我国腐败影响的相关研究中,目前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仍然较为单一。面对我国复杂的政治生态,应采用混合研究的方法去逐步验证已有的结论并探索新的发现,不能片面做定论。

(三) 社会因素

不可忽略的是,社会文化因素也在某种程度上对腐败产生影响。例如宗教的影响、文化价值观、殖民传统、法律传统和民族语言分化等,这些社会文化因素都可能是腐败产生的诱因。因此,本节主要从社会因素中的三个维度即法律、社会支持、社会文化进行梳理归纳。通过对影响腐败的社会因素的整合,有助于深入理解腐败产生的多种动因。

1. 法律

法律因素是不能忽略的腐败影响因素之一。La Porta 等人^{[42]222-279}提出,法律体系反映了国家相对于财产所有者的相对权力;Treisman^{[3]399-457}进一步认为,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产生不同程度的腐败,例如英国的法律传统倾向于强调程序公正,所以前英国的殖民地不那么腐败。此外,虽然研究认为社会主义起源的国家会有较高的腐败程度,但当控制其他因素后,法律要素是微不足道的腐败影响因素^{[42]222-279}。现阶段,我国法律体系对腐败产生何种影响的研究甚少,这可能成为未来新兴的研究关注点。

2.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是指政府为了帮助居民而提供稀缺资源的意愿,是影响腐败的又一重要因素。社会支持措施被认为是腐败的有力预测指标,研究表明减少社会支持会导致不平等,间接促进腐败,因此增加社会支持是控制腐败的良好举措^[50]。社会支持的理论也表明,跨国家和社区的犯罪率与社会支持水平呈反向变化^[51]。具体而言,社会支持措施包括 AFDC(抚养子女援助)和国家对社会计划(如医疗保健、教育)的支出。Pratt 的测试表明,以国民生产总值在医疗保健上的投入百分比衡量,发现社会支持与杀人率之

间呈负相关关系^[52]。这意味着某种程度上，一个国家的公共医疗支出可以合理反映一个国家愿意接受援助的情况，因此用公共医疗支出作为衡量社会支持的指标较为合适^{[50]204-217}。相关研究还探讨了医疗支出对腐败的影响，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133个国家的数据集，结果表明较高的腐败与较低的医疗支出水平相关，且无论医疗支出的制度类型如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高和妇女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国家都有较好的健康水平。医疗支出与健康水平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在控制模型中的其他因素之后，研究增强了对医疗支出水平与腐败之间概念和理论联系的理解，包括腐败如何调节影响健康水平^[53]。通过梳理社会支持对腐败产生影响的研究，可以发现提升社会支持力度可以较好地抑制腐败，这为我国的反腐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见解。

3. 社会文化

社会文化是影响腐败的重要一环。无论是东方或是西方的研究皆较为认可社会文化可能对腐败产生较大的影响，被认为是预测腐败与控制腐败的良性手段。在西方，亨廷顿的西欧、拉丁美洲和共产主义国家的文化区域是腐败预测的指标^{[17]215-240}，并且Hofstede的文化价值，如权力距离、不确定性回避和男性气概也是腐败的重要预测因素^[54]。尽管一些学者认为民族语言分化会增加腐败^[55]，但将人均收入和所处纬度控制后，其显著性消失^{[42]222-279}。但仍不可否认的是社会文化对于预测腐败的重要价值。在中国，社会文化如何影响腐败的探究也较多，主要是基于中国是典型的人情社会。例如有学者设计腐败实验探究官员的社会身份对腐败产生的影响^[56]，还有学者创新性地对腐败的跨文化比较进行研究，发现清廉国家除了平权加个人主义的市场理性模式之外，还存在法国、日本等容许较大权力差距认同的其他模式^[57]。另外，有从性别的角度研究不同性别人员的腐败行为的差异，通过对中国公职人员进行腐败容忍度问卷调查发现：女性对政府腐败现象的容忍度整体低于男性；“权色交易”是所有政府具体腐败行为中两性腐败容忍度差值最大的一项^[58]。官本位文化也是学者乐于探讨的，有研究发现官员身份是导致腐败泛

滥的原因之一，因而破除官本位文化是我国反腐败的重要手段^{[56]869-892}。

4. 小结

概言之，有关社会因素对腐败影响的探讨呈现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趋势，实证研究占主流的同时也有一些经典的理论探讨。我国与国外的研究情况有所差异，国外较为偏重宗教、法律、社会支持对腐败影响的探讨，而在我国偏重社会文化对腐败影响的探究——这也符合我国的现实状况，且这部分研究质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较为密切。在国外，性别差异对腐败的影响一直是研究热点，而在国内也逐渐开始关注这一动态。但需要指明的是，一些较为微观的社会因素如社会心理等，还是较少有研究关注到其与腐败的联系。所以，在注重研究宏观影响要素的同时，应该深入挖掘微观的影响要素，并结合实际情形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四）媒体因素

诸多研究表明，新闻媒体和其他媒介的使用往往会减少腐败^[59-60]；公众获取信息是对当地政府的有力威慑；新闻自由与腐败水平存在关联^[61-62]。正如有研究所解释的，个人可以通过媒体公布的手段来发表他们对腐败的看法，通过加大腐败的曝光率而减少腐败发生的几率。

具体来看，不同媒体类型也会对腐败产生不一致的影响。Goel等人^[63]探究互联网如何影响腐败认知和腐败经历，结果发现腐败认知受到互联网意识的高度影响，然而互联网意识对腐败体验的影响尚不明确。因为较高的互联网意识减少了家庭腐败经历的频率，同时增加了企业腐败经历的频率。除此之外，传统媒介（如报纸）对腐败的影响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有研究认为由政府控制大部分媒体（特别是报纸）的国家往往有较高的腐败程度^{[59]341-382}；更高水平的报纸发行量会减少腐败的发生^[64]。同时，媒体行业的激烈竞争也会提高新闻报道在监督腐败方面的有效性。总体而言，媒介对腐败的影响较为突出，但也受限于采集的数据与测量方式^{[5]746-767}，因而需要合理选择样本框与测量手段，加大对媒体因素的关注。

另外，相关研究关注到了人口特征，如教育

水平等作为调节变量,也会影响媒体自由与腐败之间的关系。比如 Ahrend^[65]发现,在缺乏新闻自由的国家,教育水平(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提升可能对腐败没有预期的积极影响; Francken 等人^[66]研究表明在文盲人口较多的地区,印刷媒体(报纸和宣传活动)的影响非常有限,而广播则具有更强大的影响力。Lindstedt 等^{[64]301-322}认为,如果宣传和问责制条件薄弱,那么即使曝光相关信息也不会阻止腐败,其研究也表明提高教育水平会提升公民理解媒体所提供信息的能力。同样的,有研究认为更高的举报意识会引致观察到更多的腐败现象。一项美国调查显示:基于互联网情形,举报人高度的法律意识似乎在揭露腐败方面更为有效^[67]。因此,我们也要关注到人口特征在媒体因素对腐败产生影响中的作用,不同的教育程度、意识形态都可能影响到媒体揭露腐败所发挥的功效。

综上,媒体对腐败的影响较为突出,在当下互联网时代体现得更加明显。现阶段关于媒体对腐败产生的影响在国内还是较为新颖的研究点,而在国外则已产生了较多研究成果,但是总体上相关的实证研究较少,媒体的使用对腐败的影响机理还有待深入挖掘。同时,一些研究表明在媒体与腐败之间还有中间因素的影响,因而需要进行中介机制的解释分析。在我国的反腐败研究中,媒体因素是值得不断挖掘的研究点。众所周

知,不少高官落马源于媒体的曝光,那么究竟媒体因素在反腐过程中发挥多大的作用?是否还受到其他重要因素的影响都需深入探究。

四、讨论与研究展望

本文详细梳理了腐败测量方式和影响因素的已有文献,着重归纳了影响腐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媒体因素,以探究形成腐败的根源,也为后续研究正确运用腐败测量方式奠定基础。总体上,本研究有如下发现:(1)腐败测量方式分为主观与客观,两种测量方式相互补充,相互验证,缺一不可,不能过度依赖其中一种方式做研究。(2)腐败测量的科学性离不开对腐败根源的探讨。本研究通过探讨影响腐败的四大类因素来理解腐败为何产生,发现腐败与经济、政治、社会、媒体都有高度关联,并提出了影响腐败的四因素模型,如图1所示。(3)总的来看,腐败测量方式和腐败影响因素的研究均已进入了较为成熟和规范的阶段,除了经典性的理论探讨外,更多研究以定量分析展开,且在变量操作化、模型构建以及分析层面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多学科技术手段。(4)从国内的研究来看,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均趋向与国际接轨,对腐败的研究已有共识性的认知,但仍有一些地方需要更多的探索与修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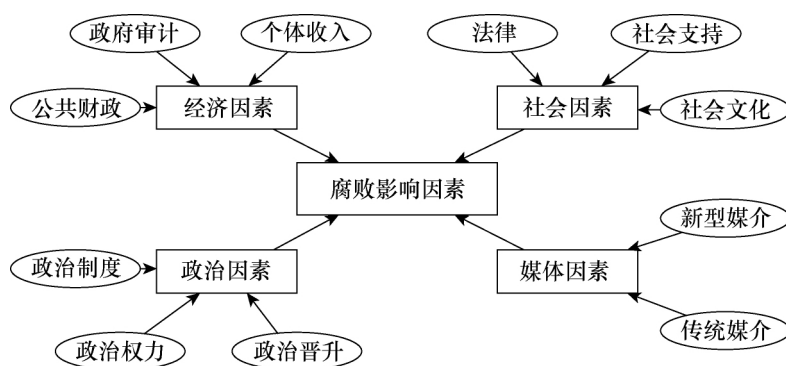


图1 影响腐败的四因素模型(作者自制)

本研究对我国的反腐败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一是在操作与数据层面,本文综合现有文献,建立了经济、政治、社会和媒体四个维度的腐败影响因素模型,并且每个因素都分解为不同

维度。这些具体维度可以进行变量操作化从而形成若干的测量指标,由此形成关于腐败测量与影响因素的大型数据库,给我国的腐败问题研究提供较好的数据支撑,尤其是量化分析。无论是宏

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皆可利用这些数据进行新的探索，从而推动我国反腐败研究的学术积累。二是在问题意识层面，研究表明国外的研究问题与我国研究的关注点仍有差异。虽然研究问题的提出要基于我国的现实状况，但是在一些维度上可以借鉴国外的研究思路。例如可以去探讨法律、社会支持、个体收入、政治心理等要素对腐败的影响，同时也需要结合我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对一些传统的要素如社会文化对腐败的影响可以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去做更深入的探究。三是在理论解释上，不少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在结果解释上陷入“理论的贫困”，让读者对研究的质量大打折扣。这固然有数据来源、调查对象的差异，也因为在腐败的理论分析框架上还未达成共识，尚未发展出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未来需要在综合中国和西方的反腐研究故事的基础上，阐明腐败的逻辑机理，加强学术对话和理论积累，才能开发出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当然，现有研究还有几点不足之处：首先，从既有的实证研究来看，虽然定量研究占主导，但是高质量的调查研究较少，都是使用第三方数据为主。这与腐败这一敏感话题的性质有关，依靠研究者去收集数据举步维艰。其次，在对腐败进行测量时，主观与客观数据结合测量的较少，往往使用某一种方式，导致研究结论难免有失偏颇。最后，在对腐败影响因素的探讨上，较为偏重宏观因素的探讨，而忽视了一些微观要素对腐败可能造成的影响，致使对微观个体的作用机制知之甚少。

因此，在未来研究中，本文认为会出现如下趋势：第一，腐败测量方式更加多元化。无论是依据企业组织、公民个体去感知的腐败水平，还是去收集已经发生或者曝光的腐败案件，都无法掌握腐败的真实“分母”。这是对数据来源的致命挑战。在今后的研究中，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腐败测量指数，而是利用一些新兴的数据库、使用新技术如数据挖掘或进行自主测量等方式，与先前的测量方式相比更加多元，测量也相对客观。但是由于测量成本较为高昂，并且世界范围内的腐败测量仍然主要依靠传统的经典测量指数，故会呈现传统指数为主、多元并存的腐败测量

格局。

第二，腐败研究的理论与实证并举，实证占主流地位。现有的反腐败文献已多为实证研究，可预见在未来的反腐败探究中仍然是实证研究占主流地位，且以定量研究为主。基于腐败是较为敏感的话题，但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两个特点决定了腐败研究以大规模数据分析为主。这样既能够全面客观地评价腐败，又能够较好地处理一些敏感事件。但是，对腐败的理论性探讨也不可废弃。众多定量研究之所以得出相反的结论，部分根源于对腐败机理的理论认识不足。比如假定调查对象对腐败的认知是一致的，其实对于什么是腐败仍然是一个因人、因时、因地区、因文化而异的难题；又如对腐败因素的作用机理不甚明了，中介变量、调节变量等未能识别。这些问题都是源于理论解释上的“贫困”，需要加强对腐败问题的理论探讨，特别是源头基础理论，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证研究。

第三，更为关注腐败的微观影响因素。从目前的腐败影响因素研究来看，多为关注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较少涉及认知、心理、行为等微观影响因素的探究。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的心理甚至是记忆都会对腐败产生影响。国外已开始致力于此类研究。在未来，将会更侧重探索微观因素对腐败产生的影响；还要在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之间架设桥梁，以搭建起反腐败研究的中层理论体系。

第四，国内研究与国际研究并轨。从已有研究成果的质量来看，虽然国内外关于腐败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具体表现在国内研究中使用跨国数据研究较少、问题意识不强、对结论缺乏延伸探讨等，但也可初见国内研究与国际研究接轨的端倪，具体表现在使用的统计模型已无较大差异、使用的操作软件也几乎一致，并且对一些国际腐败研究的热点问题都有相关探讨。在未来，这种研究趋势将会更加明显。中国的反腐研究是国际反腐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需要中国的学者具有学术自觉，能够运用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来解剖国内发生的反腐故事，形成“本土”理论贡献与西方进行学术对话。可以预见，国内关于腐败测量以及影

响因素的探究将更好地接轨国际, 其研究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方法层面都将会更科学、更有信服力。

参考文献

[1] SCOTT K, POWLES J, THOMAS H, RECHER B. Perceived barriers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ublic health in Bulgaria: A qualitative study [J]. *Int J Public Health*, 2011, 56 (2): 191-199.

[2] TREISMAN D. What have we learned about the causes of corruption from ten years of cross-national empirical research [J].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7 (10): 211-244.

[3] TREISMAN D. The causes of corruption: A cross-national study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0, 76 (3): 399-457.

[4] MAURO P. Corruption and the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8 (69): 263-279.

[5] STAFFAN A, PAUL M H. The politics of perception: Use and abuse of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s approach to measuring corruption [J]. *Political Studies*, 2009 (57): 746-767.

[6] KENNY C. Measuring corruption in infrastructure: Evidence from transition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J].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9, 45 (3): 314-332.

[7] SELIGSON M A. The Measurement and impact of corruption victimization: Survey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 [J]. *World Development*, 2006, 34 (2): 381-404.

[8] OLKEN B A. Corruption perceptions vs corruption reality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9, 93 (7-8): 950-964.

[9] ESCRESA L, LUCIO P. A new cross-national measure of corruption [J].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17, 31 (1): 196-219.

[10] 江卓, 季程远. 怎样测量腐败: 国内外腐败测量方法述评 [J]. *新视野*, 2016 (3): 122-128.

[11] FERRZ C, FINAN F. Exposing corrupt politicians: The effects of brazil's publicly released audits on electoral outcome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8, 123 (2): 703-745.

[12] GORODNICHENKO Y, SABIRIANOVA —

PETER K. Public sector pay and corruption: Measuring bribery from micro data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7, 91 (5-6): 963-991.

[13] TORREZ J. The effect of openness on corruptio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2002 (11): 387-403.

[14] COLLIER M W. Explaining corruption: An institutional choice approach [J]. *Crime Law Soc Ch*, 2002, 38 (1): 1-32.

[15] JUDGE W Q, McNATT D B, XU C. The antecedents and effects of national corruption: a meta-analysis [J]. *World Bus*, 2011, 46 (1): 93-103.

[16] MALQVIET M, HOA D T P, THOMSEN S. Causes and determinants of inequity i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in Vietnam [J]. *BMC Public Health*, 2012, 12 (1): 641.

[17] PALDAM M. The cross-country pattern of corruption: Economics, culture and the seesaw dynamics [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2 (18): 215-40.

[18] ALBERTO A, RAFAELI D T. Rents, competition and corrup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89): 982-94.

[19] GYLFASSON T. Nature, power and growth [J].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1 (48): 558-88.

[20] 黄寿峰, 郑国梁. 财政透明度对腐败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的证据 [J]. *财贸经济*, 2015 (3): 30-42.

[21] 黄溶冰, 赵谦.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与审计的探讨 [J]. *审计研究*, 2015 (1): 37-43/83.

[22] 罗也骁, 段龙龙. 城镇化、转移支付与地方官僚腐败 [J]. *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4): 88-93.

[23] FRIEDMAN E, JOHNSON S, KAUFMANN D, et al. Dodging the grabbing hand: The determinants of unofficial activity in 69 countries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0 (76): 459-493.

[24] JOHNSON S, KAUFMANN D, SHLEIFER A. The unofficial economy in transition [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97 (27): 159-239.

[25] 余泽泽, 张少辉, 杨晓章. 税收负担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来自跨国的经验证据 [J]. *经济管理*, 2017 (6): 162-177.

[26] 宋夏云, 陈一祯. 国家审计在政府官员腐败治理中功能发挥的优化对策思考 [J]. *管理世界*, 2016

(7): 176-177.

[27] 刘泽照, 梁斌. 政府审计可以抑制腐败吗?——基于1999—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5 (1): 42-51.

[28] 陈丽红, 张龙平, 朱海燕. 国家审计能发挥反腐败作用吗[J]. 审计研究, 2016 (3): 48-55.

[29] GLAESER E, Jose A. SCHEINKMAN J A, SHLEIFER A. The Injustice of Inequality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3 (50): 199-222.

[30] YOU J-S, KHAGRAM 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equality and corruption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5, 70 (2): 136-157.

[31] 倪星, 原超. 经济发展、制度结构与腐败程度——基于2006—2010年G省2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4): 134-145.

[32] 李金珊, 王郑丰, 陈小红. 腐败程度的影响因素及其时空影响差异——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科研管理, 2016 (2): 72-79.

[33] 寇铁军, 胡望舒. 财税法制建设与反腐败成效: 基于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研究[J]. 财政研究, 2016 (11): 19-30.

[34] 方晋. 腐败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J]. 经济科学, 2004 (1): 55-64.

[35] WEDEMAN A. Double Paradox: Rapid Growth and Rising Corruption in China [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272.

[36] WEDEMAN A. Double paradox: Rapid growth and rising corruption in China [J]. Politics in the Face of Financial Crisis, 2013, 11 (1): 286-288.

[37] PERSSON T, TABELLINI G, TREBBI F. Electoral rules and corruption [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3, 1 (4): 958-989.

[38] MONTINOLA G R, JACKMAN R W. Sources of corruption: A cross-national study [J].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2 (32): 147-170.

[39] 李辉, 呼和那日松, 唐敏. 民主、主观经济评价与腐败感知——基于亚洲、非洲与拉美舆情表合并数据的多层分析[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5 (3): 162-174.

[40] BAC M. Corruption and supervision costs in hierarchies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6 (22): 99-118.

[41] LAPALOMBARA J. Structural and institutional aspects of corruption [J]. Social Research, 1994,

LXI: 325-350.

[42] PORTA R L, et al.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J].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999 (15): 222-79.

[43] GATTEI R, FISMAN R. Decentralization and corruption: Evidence across countries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2 (83): 325-45.

[44] BRENNAN G, BUCHANAN J. The Power to Tax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160-180.

[45] PEIXOTO S G D, ROCHA F F, NISHIJIMA M, et al. Decentralization and corruption: Evidence from primary health-care programmes [J].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012 (19): 1885-1888.

[46] 陈刚, 李树. 官员交流、任期与反腐败[J]. 世界经济, 2012 (2): 120-142.

[47] 曹伟, 杨德明, 赵璨. 政治晋升预期与高管腐败——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经济学动态, 2016 (2): 59-77.

[48] 李后建, 张宗益. 地方官员任期、腐败与企业研发投入[J]. 科学学研究, 2014 (5): 744-757.

[49] 聂辉华, 王梦琦. 政治周期对反腐败的影响——基于2003~2013年中国厅级以上官员腐败案例的证据[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4 (4): 127-140.

[50] ZHANG Y, CAO L, VAUGHN M S. Social support and corruption: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corruption in the world [J]. The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009, 42 (2): 204-217.

[51] CULLEN F T. Social support as an organizing concept for criminology [J]. Justice Quarterly, 1994 (11): 527-559.

[52] PRATT T C, CULLEN F T. Assessing macro-level predictors and theories of crime: A meta analysis [J]. Crime and Justice, 2005 (32): 373-450.

[53] FACTOR R, KANG M. Corruption and population health outcomes: An analysis of data from 133 countries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J]. Int J Public Health, 2015 (60): 633-641.

[54] HUSTED B W. Wealth, culture and corruptio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9 (30): 339-60.

[55] MAURO P. Corruption and growth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10 (3): 681-712.

[56] 雷震, 田森, 凌晨, 张安全, 李任玉. 社会身份与腐败行为: 一个实验研究[J]. 经济学(季刊),

2016 (3): 869-892.

[57] 王程韩. 腐败的社会文化根源: 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J]. 社会科学, 2013, (10): 28-39.

[58] 郭夏娟, 涂文燕. 女性是否比男性更清廉? ——基于中国公职人员腐败容忍度的分析 [J]. 妇女研究论丛, 2017 (4): 5-16.

[59] DJANKOW S, et al. Who owns the media [J].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003, 46 (2): 341-382.

[60] CHOWDHURY S K. The effect of democracy and press freedom on corruption: An empirical test [J]. Economic Letters, 2004 (85): 93-101.

[61] BRUNETTI A, WEDER B. A free press is bad news for corruption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3 (87): 1801-24.

[62] STAPENHURST R. The Media's Role in Curbing Corruption [M].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Institute, 2000: 1.

[63] GOEL R K, NELSON M A, NARETTA M

A. The internet as an indicator of corruption awareness [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2 (28): 64-75.

[64] NAURIN D, LINDSTEDT C. Transparency is not enough: Making transparency effective in reducing corruption [J].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0, 31 (4): 301-322.

[65] AHREND R. Press Freedom, Human Capital and Corruption [C]. DELTA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002-11, Delta, Paris, February.

[66] FRANCKEN N, MINTEN B, SWINNEN J F. M. Listen to the Radio! Media and Corruption: Evidence from Madagascar [C]. Discussion Paper No. 2005-115, LICOS Centre for Transition Economics, February.

[67] GOEL R A, NELSON M A. Whistleblower laws and exposed corrup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 Applied Economics, 2014, 46 (20): 2331-2341.

The Measuremen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rruption: A Literature Review

Xu Guochong, Zhu Jianghuafeng

【Abstract】 There are various researches on corruption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which focus on the discussion of its causes and influenc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combs the classic literature from the aspects of corruption measurement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rruption to present the dynamics of corruption research.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measuremen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rruption methods has entered a relatively mature and standardized stage. In addition to the discussion of classical theory, more research is carried out with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the variables are manipulated, model set and analysis level used multidisciplinary techniques more frequently. And domestic research, whether research question or research method, tends to be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rruption and divides it into four factors: economic, political, social and media. In the future research, we can deeply explor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orruption measurement methods, the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of corruption, the micro-influence factors of corruption, and the empirical operation of corruption.

【Key words】 Corruption, Corruption Measurement, Influencing Factors, Literature Review